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

主编 黄琦 刘学军

直面金融风险

黄根兰◎主编



周小川 | 吴晓灵 | 李扬 | 华生 | 徐忠
多位名家纵论改革大势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

主编 黄琦 刘学军



直面金融风险

黄根兰◎主编



周小川 | 吴晓灵 | 李扬 | 华生 | 徐忠

多位名家纵论改革大势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面金融风险/黄根兰主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9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黄琦, 刘学军主编)

ISBN 978 - 7 - 5095 - 7681 - 6

I. ①直… II. ①黄… III. ①金融风险 - 风险管理 - 中国 - 干部教育 - 学习参考
资料 IV. ①F83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2425 号

责任编辑: 翁晓红

责任校对: 杨瑞琦

封面设计: 田 哈

版式设计: 齐 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2.75 印张 350 000 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7681 - 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文章稿酬及版权联系电话: 010 - 68457872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0414 QQ: 447268889

总序

高举全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近40年的光辉岁月。近40年来，我们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我们从无到有构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断进行完善，我们扭转了“文革”的动荡混乱走向依法治国，并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事业当然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的航程历经千难万险，但是改革的开拓却从未停歇。战胜这些困难、推动中国改革不断进步的，是站在改革潮头的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是我们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前进的中坚力量。从“要吃米、找万里”的童谣到“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习仲勋等早期的特区开拓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证和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梁八柱”的构建，如果没有党员干部对改革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就没有今天改革事业的辉煌成果。

一、坚持市场方向的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近40年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中国改革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最终使得国家在各个层面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

位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这五个方面的伟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制定了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以这份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定》为基础，中国改革事业在战略布局、改革难点以及市场地位方面都获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乃至突破。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获得重大突破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就是从以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逐渐变革成为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进程当中，市场的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挑战。世界经济严重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新的“洗牌”。与此同时，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继续进行深刻的调整和改革。中国经济面临着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和调结构的两难困境。在这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央及时作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决定和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开启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结构之变。

（三）国家政治体制顶层设计适应新的要求、获得新的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要求对过去领导改革的行政部门本身进行改革，对改革领导者的决策效能和执行力提出了重大考验。为了推进改革，中央先是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有力提升了改革的决策效能，使过去总是被回避的改革议题，比如户籍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等，能够集中力量摆脱各种利益羁绊获得正面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高还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上。全面深化改革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通过各项制度建设，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总目标。

（四）反腐倡廉效果显著，依法治国有效推进

进一步推进改革，创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需要廉洁奉公高效的党员和公务员队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查处，破除了过去一段时期因党纪国法松懈而滋生的各种潜规则，横扫了贪腐猖獗的不良风气，党纪国法为之肃然而振！中央对于滥权渎职的腐败分子，上至中央常委，下至乡村干部，不管是军方大将，还是地方大员，但凡触犯党纪国法，均依法予以严惩。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这样大规模的反腐浪潮，激浊扬清，民心得以振奋，党风得以清正，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掌握权力行使权力的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地规范行使权力、自觉避免滥权渎职行为，这为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肃清腐败的基础上，中央通过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从制度建设上、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2014年10月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

（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创造绿色环境打下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清晰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后的又一大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

密集推出，体现了党遵循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期待、彰显执政担当。

二、新时期改革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其在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健康。

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出的，中国企业在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将这一理念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最高层次，中央深改办也专门出台了各项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

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凡此种种，彰显了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

三、改革只有进行时，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掌握改革的方法和经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千千万万的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面对“啃硬骨头”的难题，而且要面对的往往是改革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艰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决策层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做好微观改革激励兼容的改革路径设计之外，还需要各个层级的党员干部增强大局意识、核心意识，自觉向中央看齐，其目的就是要发挥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优势来克服私利对改革的扭曲，这是当前推进改革所需要的，是当前各项党员学习教育培训项目的重中之重，在此无须赘言。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改革的深水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在制度架构的诸多方面可能不再适用，党员干部在坚定改革的决心之外，还有必要掌握改革的方法论，在对改革有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掌握推进改革的方法、路径，这样就能够事半功倍地推进改革。在近 40 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方法，突出的有：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

二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历程，也是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回顾中国近40年的改革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们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订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订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订更加科学，但是它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它所形成的数据和联网才有意义，否则何以持续地发展繁荣？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不动摇。

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

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当然，宏观上掌握了改革的经验和方法还远远不够，广大党员干部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具体的改革领域。这些具体领域的改革都有自己的难点和重点，其改革的方法和路径都不尽相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这次共同编纂出版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仅仅包括宏观的内容，如《未来十年的改革发展战略》《大国反腐》《大市场严监管》，因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有利于我们构建对当前整个改革进程的认知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还就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社保改革、产业变革、扶贫攻坚等具体改革领域都专门整合了分册，共同构成本丛书的主体内容，这就为广大党员干部在各自的领域学习、推进改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相信，只要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深刻地学习和领悟“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这样的改革书籍所传递的改革知识和精神，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2017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代序 深化改革才能保障金融安全 徐忠 (1)

第一篇 经济转型中，金融风险显现 / 5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胡伟俊	(7)
努力促进经济筑底及“浅V”回升	卓勇良	(12)
中国经济新周期到来了吗	何帆 朱鹤	(18)
企业债务问题：急性发作还是慢性折磨	张文魁	(22)
从于欢案透视民间金融	季卫东	(33)
“风险性三角”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	黄益平	(40)
经济运行稳定，金融风险增加	张曙光 张弛	(47)

第二篇 高杠杆？去杠杆 / 55

中国的债务与杠杆率：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张晓晶 刘学良	(57)
中国究竟是去杠杆还是稳杠杆	李迅雷	(77)
加货币与去杠杆	张曙光 张弛	(93)
“脱虚向实”为何那么难	伍戈 高莉	(101)
金融去杠杆的缘起与走向	巴曙松 王月香	(109)
降杠杆不解决中国根本矛盾，莫让系统性风险积聚	吴敬琏	(116)

第三篇 遏制资本市场风险 / 119

怎样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华 生	(121)
建设公平正义的股市	刘纪鹏	(137)
控风险是债市重中之重	高占军 刘 鹏 崔莉莉 杨恩百	(142)
建立楼市长效治理机制	左晓蕾	(165)
避免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	沈建光	(174)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和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179)

第四篇 金融开放的稳与进 / 185

金融服务业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周小川	(187)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对外金融政策调整	丁志杰	(192)
构建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	管 涛	(200)
人民币国际化如何与外汇储备管理政策相协调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	(207)
危机十年的中国领悟	程 实	(216)
亚洲金融危机的三点启示	沈建光	(221)

第五篇 金融科技创新的机与危 / 227

金融科技发展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政策取向	廖 岷 万建华	(229)
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建议	胡 滨 郑联盛	(246)
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吴晓灵	(258)
互联网金融宜采取合作监管模式	高晋康 唐清利	(264)
数字货币及其监管	谢 平 石午光	(268)
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竞争性不可忽视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	(278)

第六篇 以改革严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283

金融要回归本源	吴晓灵	(285)
金融监管要“长牙齿”拒绝“父爱主义”	刘 鹤	(288)
以宏观审慎为核心，推进金融监管改革	李 波	(292)
中国金融监管架构重构研究	张承惠 陈道富	(306)
提高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黄益平	(314)
“十三五”时期金融的基础性改革	魏加宁	(319)
创造便利资源有效配置的货币金融环境	李 扬	(333)
正视金融风险背后的公司治理缺陷	徐 忠	(339)

深化改革才能保障金融安全

徐忠*

2016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保持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进展，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持续优化，经济新的动能正在积聚，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也在加快，金融体系整体平稳运行，成绩来之不易。

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经济金融发展稳中有难、稳中有险，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逐步显现，维护金融安全面临艰巨挑战。这也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风险有所积聚……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背景。

每当改革发展遇到重大困难时，总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面对复杂的金融风险形势，策略上应“以保为主”，避免问题恶化，主动放缓改革节奏，甚至出现改革倒退；另一种声音认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恰是关键改革不到位或配套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策略上应坚持“以改为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化解风险于改革创新之中。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和金融改革尤其是监管改革备受关注。必须看到，虽然分业监管

* 徐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体制在历史上金融业态相对简单的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和跨行业金融产品迅猛发展，我国金融体系正如已行驶多年的汽车，这也出问题，那也出问题，仅仅依靠日常保养维护，已无法保证行驶安全了，必须大修后才能再上路。在此背景下，我认为，“保”是消极防御，为保而保、以保为主势必适得其反，可能导致风险防不住、底线保不住。“改”是积极作为，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根本途径。

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保”，要保什么？从根本上说，“保”是基于底线思维，是非常态下应对危机的机制和措施，“保的是底线，只有形势发展到底线时才需要保”。就金融风险而言，“保”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底线之上，过度追求“保”必然妨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无法有效化解已有的风险，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风险产生、积累和传染的根源，还会造成激励机制扭曲，最终催生新的风险。

“以保为主”将“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曲解为“零风险暴露”。许多本该有序化解的个体性、局部性、短期性风险因素迟迟不能得到处置，可以通过风险暴露而疏导的压力长期得不到释放。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法发挥，固化并加剧了原有结构性矛盾，导致风险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大而不能倒的风险领域越来越多，系统性风险压力显著加大。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是“以保为主”理念的突出表现。一旦房价上涨，管理者则担心风险，采取限购、限贷等行政化色彩较浓的干预手段抑制需求；而一旦经济走弱，管理者希望以房地产投资提振经济增长的时候，又会采取反向措施促进房地产发展。房地产调控政策长期以短期调控目标为导向，而土地财政、供地制度、房产税以及房地产在经济增长和调控中的作用等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未实质推进，三、四线城市库存未除，一、二线城市泡沫又起。

“以保为主”主张“零风险暴露”，采取事实上“花钱买稳定”的策略。其结果是微观上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盛行，宏观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无限救助，造成了严重的激励扭曲，催生道德风险：投资者长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企业和金融机构因风险不必自担而过度承担风险；监管部门

因成本外生的无限救助，存在放松监管的逆向激励。当前，许多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进行高杠杆投资套利，金融市场紧绷下各类意外事件往往形成不小的市场震荡，过分强调市场稳定就可能倒逼央行货币投放，在这一具有明显道德风险特征的制度格局下，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必然在整体资本水平不足情况下进一步扩张，最终导致更高的杠杆率和潜在风险。历史上，我国每次出现金融风险，在治理策略上都是重债务风险处置，轻制度和约束机制建设，必然加剧了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风险反复滋生。

当前我国面临的风险、困难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渐进性改革无法一蹴而就，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结果。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破除风险和困难背后的体制根源，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我国实践证明，唯有改革才是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破解发展难题的唯一出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坚定地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为近3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国企改革、加入WTO等，释放经济活力，创造了稳定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保增长政策虽然对短期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未及时推进，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和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有所固化，过度刺激保增长的做法也不利于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当前我国各种潜在的金融风险实际上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既有金融体制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经济结构矛盾和经济体制转轨不到位的因素。因此，当前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是深入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要加快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一是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定地淘汰落后产能。去库存的关键是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价格机制等来有力改变激励机制。降成本要加大

简政放权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落到实处。补短板既要补“硬”的短板，也要补“软”的短板；既要补发展短板，更要补制度短板。

二是以强化金融监管为突破口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我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主要在改革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以适应日趋明显的综合经营格局。中央银行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纠正现行体制下监管机构地盘意识和行业保护倾向，统筹监管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库制度，增强市场透明度，实行穿透式监管，实现风险监管全覆盖；二是要赋予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为其他金融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官网，2016年12月27日）